

对我研究生涯和组织与创业领域作品的反思

□ Howard E. Aldrich

摘 要：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描述我从社会学研究生到小企业研究人员，最后成为一名创业学者的 50 年历程。在密歇根大学，我学习了社会学研究的技巧，然后在康奈尔大学时开始进行组织研究。我的早期研究被归类为“小企业”研究，但当组织和管理学者对新企业和商业创造变得更感兴趣时，我又被归作了“创业研究员”。我将通过描述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研究项目来解释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将演化思维应用于创业问题中，并鼓励使用面板设计进行研究以捕捉企业和行业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我将给年轻学者们提供一些关于如何进行创业研究的建议，并通过突出我目前对匠人和创客空间的研究作出总结。在新兴的全球创客运动中，我看到了巨大的创业前景。

关键词：组织演化；创客运动；创业环境；资源依赖；职业生涯

首先，我将介绍我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经历。在此期间，我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那里学习了社会学研究的技巧。早期对英美企业传承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关于组织创立和解散的研究，我还将介绍前者的起源。其次，20 世纪 70 年代是组织理论的关键时期，我将回顾在那段时间里影响我思想的主要因素，其中尤为重要是演化观点和资源依赖理论。接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成为一名创业学者，我将回顾催化这个身份的环境。如果年轻学者们正考虑将管理、组织和创业研究作为他们一生的工作，那么我会根据我的经验给他们建议。最后，我将介绍我目前关于全球创客运动的研究项目及其对创业的未来影响。

一、我如何开始我的学术生涯

1965 年我毕业于俄亥俄州 Bowling Green 州立大学，主修社会学，辅修心理学。

毕业后，我进入了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院。在安娜堡度过的四年中，我感到学路漫漫。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卓越的：它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项目都排在前十位。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联邦资金的意外注入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加活跃，特别是在城市环境、犯罪、种族和人种关系研究领域。

我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并辅修了社会心理学。我还参加了其他系的课程，包括数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例如，我跟随 George Katona (1964) 学习了“消费者行为学”，他是一位经济行为心理学的领军人物。我还参加了两次著名政治行为学家 Phil Converse (1976) 的研讨会。在 Converse 的研讨会上，我使用三轮面板数据来研究选民政治认同的变化。那篇论文的写作让我认识到了面板研究数据的价值，我随后进行的许多研究都使用了这种设计。

研究生在读期间，我对心理学家 Donald Campbell (1969) 的研究十分着迷。他创造了“演化认识论”这一术语，并为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外还有 Walter Buckley (1967) 这位撰写一般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家，以及 Daniel Katz 和 Robert Kahn 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我修读了 Katz 的研究生课程，在这门课程中，我们使用了他手稿版的著作——《组织的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Katz & Kahn, 1978)。Katz 就理论构建方面给了我一些让我至今难忘的建议：“好好设计你的理论框架，让其成为其他研究者学术观点的基础。”熟悉演化观点及其涵盖范围的读者将会理解我对 Katz 的建议有多么重视。我一直认为演化观点是一种元理论，

即一种包罗万象、允许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之进行比较和整合的框架。它并不是提供一套类似于法律的控制演化过程的表述，而是从其他途径中吸收所需要的东西，它带有兼收并蓄的目的。

密歇根大学为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机会，其中包括通过社会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SR) 开展研究项目的机会。我是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项目的研究主任。通过这些项目，我获得了设计调查问卷和与访谈、编码人员合作的经验。在 1966 年夏天，我开始着手研究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国内骚乱的推动下最终成为一个自然实验。在我的导师的指导以及美国犯罪委员会的资助下，我开始对三个美国城市（波士顿、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的高犯罪率地区中的约 800 家企业和组织进行第一轮访谈。我们寻找的是正在经历非常迅速的种族演替的地区：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芝加哥的南部和西部，以及华盛顿特区佐治亚州的第七大道和第十四街走廊。这三个城市都受到 1967 年和 1968 年市民骚乱的严重影响。

因为我在 ISR 的工作经历，到 1968 年开始准备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我已经具备了雇用自己的研究团队所需的技能。我的研究问题来自于我对人类生态学和种群层次思维的兴趣。在我的论文中，我试图从演化的角度来理解种群。我回到了我们 1966 年研究过的高犯罪率地区，并进行了第二轮访谈。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聘请了采访者，让他们搭载飞机抵达不同的城市，安排他们住在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s) 和便宜的汽车旅馆里，并监督他们的日程安排。我自己

做了很多访谈——我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穿梭在衰败的内城区，采访企业主的运营情况，并询问他们如何应对艰难的商业环境。亲自开展过研究的经历是非常有益处的——我把许多人在研究生院花五六年时间（几乎就像一个延长的博士后）完成的工作压缩到了四年。我在1969年完成了我的论文《敌对环境中的组织》（*Organizations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我之所以能收集自己的数据并分析，并且还能在四年的时间里完成整个研究，是因为我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全额资助。

二、我在康奈尔大学的 第一份工作

1969年，我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工业和劳动关系学院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希望我能说自己制定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策略，其中包括选择康奈尔作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这个策略的确很奏效，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康奈尔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环境。当时《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的编辑 Bill Starbuck 在我到那里的一年后离开了，但组织行为学部还有其他的社会学同事，像来自工业和劳动关系（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ILR）学院的 William Foote Whyte。当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在《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Whyte, 1943）上读到过他的书。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研究兴趣不仅可以描述为“社会学和演化的思维”，还可以描述为“社会学范畴中的组织研究”。

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作品利用了我

在研究生院写的论文，当时我试图将演化思维应用到组织中。我重写了一篇论文，命名为《组织边界和组织间冲突》（*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Conflict*）（Aldrich, 1971），并将其投稿给《人事关系》（*Human Relations*），做了一些小修改后就被接收并发表了。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如果不关注组织所处的环境，我们就无法研究组织。实际上，在对组织获取资源的环境进行解释之前，没有任何解释是完整的。那篇论文成为我后来的论文和1979年出版的《组织与环境》（*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一书的基础。我还继续研究了其他问题，但对我关于人口层面思考的论文的反馈让我意识到，“演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视角。

三、关于改变城市社区的 企业演替的早期研究

我在密歇根大学进行多轮面板研究的经验，让我有信心在自己对内城社区的生态演替的研究中进行多个面板研究。第一个是我研究生论文研究的后续，第二个是我对美国研究的海外延伸。

（一）对三个美国城市的研究

在1970年和1972年，我继续跟进了在研究生院就已经开始的面板研究的剩下两轮研究。我研究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随机样本，这些样本企业都是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进行商业活动的。随着城市郊区化进程的推移，这里的人口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同时随着白种人不断迁出，代之以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居民，种族演替（Aldrich, 1975）也正在发生。商业

人口正在适应这些变化，而我的研究设计使我能够将所有权的易手与人口的更替联系起来。我将住宅构成编码缩小到人口普查区域的水平，因为我有 1960 年和 197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所以我能在非常微观的水平上了解定居人口的变化率。

通常情况下，当企业所有权的易手给新业主带来机会时，下一个成为业主的人将是其他白人。但由于非裔美国居民在这些街区的比例越来越高，以及社区经济相对衰退，白人不再认为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首先是在非裔美国人最多的社区，然后逐渐在其他地方）的白人企业主被取代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序的过程，因为白人的比例缓慢下降，黑人成为新业主的比例逐渐上升，填补了前业主因退休、更换其他工作或去世而出现的空缺（Aldrich & Reiss, 1976）。

（二）对三个英国城市的研究

1975 年，我发现福特基金会在资助学者研究英格兰的当代问题。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检验我在美国情境下发展的一些企业演替想法的机会。我申请了资助，指出我对研究英国城市的市民骚乱对其商业群体的影响方面有浓厚的兴趣。我了解到在英国人们对新英联邦地区的移民普遍反对；许多移民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或加勒比地区的人。我认为在一个与美国相似的发展过程中，观察一下英国城市居民人口的流动是否对商业群体产生影响将会十分有趣。我向正在操作这个资助计划的伦敦环境研究中心提出了这个研究计划，他们给了我一笔研究资助。于是 1975 年秋天我在伦敦做了一个

前期项目。

在一个小型研究团队的协助下，我在伦敦一个叫 Wandsworth 的地区进行了大约 250 次访谈。该地区拥有数量相当大的西印度和亚洲人口。我发现我在美国工作中使用的许多演替概念也完美地适用于英国。我了解到其中一些业主不清楚如何与顾客打交道，白人业主也似乎对在 Wandsworth 购置店铺不感兴趣。这些证据足以说服利物浦理工学院的一些社会地理学学者加入我的研究。我们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经费申请，并且获得了资助去进行美国和英国的比较研究。

我们与三位社会地理学家合作设计了一项四轮面板研究，跟踪数百家小型企业，其中主要是零售商和服务机构。我们于 1976 年开始规划该项目，并于 1978 年、1980 年、1982 年和 1984 年在三个城市进入场域展开了问卷调查（Aldrich et al., 1983）。利用选民登记名单，我们的编码能够具体到 10000（100×100）平方米的居民构成水平，因此我们拥有极好的微观数据。所有区域的调查都持续了 30 分钟到两个小时不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数据。

我在美国观察到的生态演替的动态过程与英国的模式契合很好。与在美国的情境一样，英国企业的更新率相当高，因为一群企业主（主要是白人）被另一群企业主（主要是南亚人）取代了。我们最终从收集到的数据中完成了大约 12 篇论文，汇集成一组研究（Aldrich et al., 1985）。我与利物浦团队的合作只是海外广泛合作的开始，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与国际学者共同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

（三）我从小企业研究中学到了什么

我的两项小型企业演替研究是我研究策略的一般性范例：我先选择一个项目，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个项目有关现象的基础信息，探索可检验的想法并开展先导项目，然后提出一个全面的研究设计。我不喜欢横截面研究设计。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你想学到东西，你必须观察它的变化过程（Aldrich, 1992）。这种项目的设计和产出成果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例如，那两个小企业项目就包含了设计问卷、在实地预测试、选择代表性样本，以及运用面对面访谈进行四轮面板研究。我的许多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从提出设计到写作投稿花了十年时间。事实上，在英国研究这个例子中，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的论文是来自于一个始于70年代末的项目。后来，在1990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写了一本关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书也源于这个英国项目（Waldinger et al., 1990）。我喜欢使用长期动态的设计，容许我在不同时间测量相同的指标，然后还能够描述和分析解释它们为什么发生了变化（Aldrich, 2001）。

四、深化我对演化思维理解的事件

我在密歇根大学接受的教育为我的演化观点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几次机会让这些观点得以进一步提炼。

（一）斯坦福大学

1973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一个夏天启发了我正在形成中的关于组织的观点。那个

夏天的经历让我迸发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火花，而研究的结果最终形成了《组织与环境》这本书（Aldrich, 1979）。Richard Scott邀请我到斯坦福大学组织与心理健康研究培训项目做访问学者。这个项目前一年的访问学者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 Karl Weick。我估计 Scott 当时在欧洲，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与他的学生在一起研讨。我教过一门组织理论课程，班上有 Charles Snow、Kaye Schoonhoven 以及 Mike Hannan 和 John Meyers 的一些学生。除了研究医疗保健系统外，他们的学生正在研究各种“世界系统”的主题，而且我发现他们的项目很有吸引力。

把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历放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背景下，我想说，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组织理论强调的是牺牲组织创造的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组织分析的其他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开花结果，当美国两个沿海地区的理论家们对组织分析发展出不同的观点，范式的转变就对早期的方法提出了挑战。我发现我在斯坦福的经历比我在东海岸常春藤联盟社会学的浸淫更能帮助我理解这些新方法。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现了三种形成中的组织分析观点：资源依赖观（Pfeffer & Salancik, 1978）、种群生态学（Hannan & Freeman, 1989）和新制度理论（Scott, 2008）。我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对这些思想流派的接纳，帮助我形成了与我最终关联在一起的创业的演化方法。在康奈尔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职业生涯中，我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方法。

（二）发展对演化思维的理解

演化方法是理解社会变革的一般框架。创业的演化方法是一个总体性的框架，它能够与

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比较和整合。应用于创业时，演化思维的核心是假设演化过程是由企业家和组织获取稀缺的社会和物质资源的努力所驱动的（Aldrich & Ruef, 2006）。创业活动创造了变化和多样性，选择的力量在其上运行，被选择的形态之一是被保留。该方法适用于多层次的分析，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变化、选择、保留和斗争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在演化系统中产生了模式的变化。在组织社群中，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加入到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人群更有可能生存，成功人群的特征可能会扩散到同一社群的其他人群。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组织理论和管理研究的开放系统革命，演化模型数量激增。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Donald Campbell（1969）开创性研究的启发下，提出了很多演化理论，用来解释组织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各种现象。当我在密歇根时，我不仅了解了社会学家的的工作，也了解了像Campbell这样的学者的的工作，所以我才知道变异—选择—保留方法。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项目时发现这个框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通用框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机制视角，但一旦你理解了选择性保留和变异的概念，你可以将它应用于任何事情——对我而言真是一个启示。

例如，在个体层面上，Karl Weick（1979）发展了他具有地标意义的论述《组织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他在书中根据Campbell提出的变化、选择和保留的推理，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体如何协调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因为和Karl Weick同在康奈尔大学，所以在校园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也欣赏演化的方法，只不过他关注的是微观层面。

Karl和我主要通过我们的学生定期见面，因为我会出现在他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上，他也是如此。此外，参与我们课程的人员有一些是重合的。我发现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回首过去，我发现我们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就是对演化思维的欣赏。

Michael Hannan 和 John Freeman（1977, 1984）在其关于组织种群生态学的研究中也使用了一种以选择为基础的解释，其中他们强调种群中组织的建立和解体与现有环境资源的分布有关。在宏观层面上，Richard Nelson 和 Sidney Winter（1982）是应用经济变化演化模型的先驱。他们深受提出基于惯例的组织行动模式的卡耐基学派（Herbert Simon, James March 和 Richard Cyert）以及 Joseph Schumpeter 的影响，后者是“经济变革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演化过程”这一观点的杰出倡导者。

我在斯坦福大学激发的对世界系统理论的兴趣，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Immanuel Wallerstein（2004）受聘于纽约州上州的另一所大学——宾厄姆顿纽约州立大学。我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并且我发现他的一些弟子在康奈尔大学。因此，我决定尝试开设一门关于世界系统理论的课程。回过头看，我对自己当时的天真和大胆感到震惊，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正式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培训。我希望我会找到感兴趣的学生，我是正确的。Wallerstein 的一些学生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到访，Wallerstein 本人也曾从宾厄姆顿开车过来参加。世界系统视角最终囊括了我所致力于的全部分析层次：个人、组织、种群和社区/社会层次。

在这个知识背景下，我写下了《组织与环

境》，对组织及其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进行了理论化。可以说，这是关于这一观点的第一本著作——它不仅用演化的术语思考，还在多个层面思考了选择的问题。我认为组织的繁荣与失败取决于它们是否适应自身运行的环境。我早期关于演化理论的研究建立在我的生态思维框架之上，强调小企业主对所处环境的控制很有限，因此我的作品倾向于强调情境是组织变革的驱动力量。后来，当我从资源依赖理论中吸收了很多认识，我开始更多考虑人的能动性和集体行动。

（三）资源依赖的观点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的研究中未能足够强调的一个视角是资源依赖理论。我的书使用了多层次的分析，强调了一个演化的论证，但我也讨论了权力、政治、支配、治理，以及管理的两方如何战略性地争夺地位。这种动态关系是由资源依赖所驱动的。实际上，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论文中大量引用了资源依赖的概念。例如，1975年在ASQ的论文中，Sergio Mindlin和我写道：“组织行为中资源依赖视角研究的主要公理是：‘组织研究必须要在组织种群背景下进行，因为种群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竞争和共享资源的。’”（Mindlin & Aldrich, 1975）

1973年夏，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我开始与Jeff Pfeffer合作。我们首次提出了综合演化观点和资源依赖观点的论点。在斯坦福大学毕业生Karen Cook（1977）和W. Richard Scott的导师Peter Blau（1964）的研究工作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资源依赖模型的前提假设。这篇论文发表在《社会学年鉴》（Aldrich & Pfeffer, 1976），

是我被引用得最多的论文之一。在和Jeff的合作中，我意识到单独用资源依赖或演化理论来研究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尽管我1979年的那本书及后续的研究似乎倾向于从演化的角度来研究，但其实际微观机制——对人和组织之间或者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运作机制的阐释，大部分还是涉及权力和交易动态（Wry et al., 2013）。

Jeff Pfeffer和Jerry Salancik继续合作撰写了《组织的外部控制》（*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Pfeffer & Salancik, 1978）一书。他们这本著作于1978年出版，我那本于1979年出版——两种论述对我们理解组织理论提供了互为补充的观点。Pfeffer和Salancik倾向于淡化演化的思维（尽管在他们的书中也有一些选择的逻辑），我和Pfeffer则把“种群”和“资源依赖”的观点结合了起来——并且，我被认为是研究生态学（当时称为“种群生态学”）的学者。因此，我认为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两本书是组织研究社群中同一纲领性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摒弃过去单一的权变观点和理性选择观点，转向一个更加动态的政治演化思维方式。

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都在努力把我的演化研究方法与生态学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在1977年Hannan和Freeman发表他们那篇文章之前，我从未提及“种群生态学”，因为那之前我称之为“自然选择过程或种群观点”。可能是受到了斯坦福学派（指Hannan和Freeman）术语的潜在影响，在《组织与环境》这本书中，我十分粗心地把“种群生态学”和“自然选择”两个叫法互换着用了。回顾过去，我后悔使用

了“种群生态学”这个叫法，因为我觉得它造成了人们的困惑。我的许多研究工作与种群生态学的推论存在分歧。其实将我的观点说成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好，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以演化法则为依据。因此，在《组织演变》(*Organizations Evolving*) (Aldrich, 1999) 这本书中，我把叫法改为“演化观点”或“演化方法”。

五、从“小企业”学者到 “创业”学者

20 世纪 70 年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从演化角度研究组织的组织社会学家。随后，一些机缘巧合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在研究“创业”。有两件事情让我改变了对自己的定位：①受邀为一个会议写一篇关于社会指标论文；②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创业领域的前沿会议。

第一件事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是我开始研究组织形式的起源。因此，我被邀请在一个会议上发表一篇论文。为做好准备，我读了 David Birch 的著作《工作产生过程》(*The Job Generation Process*)。之后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凛冽冬日，我去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拜访了他，以便进一步了解他所收集的数据。在与他共度一日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要把组织生态学和演化理论的观点结合起来去理解企业的动态机制。Ellen Auster 是我在康奈尔的学生，她当时在哥伦比亚商学院任教，我和她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新创企业及小企业面临的问题的论文 (Aldrich & Auster, 1986)。

第二件事发生在 1985 年，当我和 Ellen 完成了这篇论文时，我收到了 Donald Sexton 的邀

请去参加他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举行的创业前沿会议。本来是安排我为 Al Shapero 的论文作评述的，但是 Shapero 身体不适，所以 Sexton 在会议召开前的那个周五打电话给我（这个会议在周一开！），问我是否愿意换成在会议上报告自己的原创论文。因为我在族群企业 (ethnic businesses) 方面的研究，我那时已经在思考社会网络的问题了。因此，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在那个周末，我和我的博士生 Catherine Zimmer 一起写了一篇短论文《通过社会网络创业》(Aldrich & Zimmer, 1986)。20 年后我和 Phil Kim 对这些观点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Aldrich & Kim, 2007)，展示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概念是如何阐明创业团队的形成的。

得州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那次会议让我注意到了创业研究的社群。我遇到的那些学者，像 Neil Churchill、Alan Carsrud、Karl Vesper、Arnold Cooper，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都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了热情，为他们的发现感到精神振奋，并对这些现象非常关心。不像我在大多数专业会议上听到的那些职业导向的闲言碎语，这些创业研究学者似乎是真正对这个研究本身感兴趣，并希望有新成员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发表的论文在这个创业研究社群引起了共鸣。因为这是连接社会网络和创业的一座桥梁，可以让创业研究更加社会学化 (Aldrich & Zimmer, 1986)。

在那次会议上，我还发现了创业研究学者中有这样一群人，让我在其中感到宾至如归。在那时，创业并非是组织研究者关心的核心问题。那些前沿的教材和高引用量的论文，例如 DiMaggio 和 Powell (1983) 有关制度同构的论

文中也没有涉及创业者、新组织的角色、新企业或者变化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而我却意外发现有几十个学者,而且主要是来自商学院的学者,在研究创业并且把这个概念和我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

因为我在得州会议上的接触,我开始参加百森商学院创业会议,并在1987年第一次在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大学的创业会议上发表了论文。那篇论文研究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科研三角园区的企业家之间的社会网络。2013年,我成为百森会议的“终身成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研究日程就从企业和组织的演变转到了创业,即创业战略、创业活动和变化。

作为一名组织研究学者,我感兴趣的许多现象在创业环境中更容易研究,因为其中的事物新颖鲜活,且规模小。新创企业构成了一个每天都有数千次重复实验的即时组织实验室。我写了几本关于新企业创建和创业网络方面的文章。在这方面,我与Marlena Fiol的合作(Aldrich & Fiol, 1994)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文章《傻瓜涌入? 产业创造的制度背景》(*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ial Creation*)中,我开始用多层次的术语来描述我的想法,并且更清晰地认识到我可以从个体、群体、组织和种群层面来看待全新的行业。这个多层次的研究方法成为我《组织演变》(Aldrich, 1999)一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收录进了我后来与Martin Ruef合作出的第二版中。

20世纪80年代,我用了一系列大规模项目把我对演化理论的研究和创业结合起来。我与Pat Ray Reese一起对北卡罗来纳州科研三角区

的数百名潜在和实际创业者进行了一项面板研究。我的学生Linda Renzulli和Amy Davis随后在她们的硕士论文项目中使用了这些数据集。我和Nancy Langton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小公司进行了一项多轮面板调研;我还与Jennifer Cliff Jennings合作,在该项目中撰写了几篇论文。在北卡罗来纳州,我、Arne Kalleberg和Peter Marsden获得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研究不同的组织抽样方法,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包括尝试在达勒姆市和科研三角园区寻找新成立的公司。

当我意识到我研究的是“创业”而非“小企业”时,我重新思考了我的研究问题,并开始就这个话题举办教学研讨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我与创业联系在了一起,并多次应邀在国际上讲授课程和研讨会。米兰的博科尼大学邀我开办为期几个月的课程。20世纪90年代,我访问了维也纳的经济大学并在该校的中小企业研究所开设了为期七年的创业课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我小儿子对日本研究兴趣的鼓舞,我在日本庆应大学也教授了两门短期创业课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Paul Reynolds开始邀请我参加美国那十年里开展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创业研究联合会(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onsortium, ERC)项目,该项目最终变成了第一次美国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PSED I)。然而,我一开始不愿意参与其中,因为我知道管理如此多样化、多成员的集体行动项目非常困难。值得称赞的是Paul从未放弃,我看到他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再做一次四轮动态跟踪调研的机会太好了,让人不容忽视。当然,

我早期偏爱的研究项目也是四轮动态跟踪调研，这并不是巧合。虽然我没有加入 PSED I 的执行委员会，但 Paul 总是说我是他“过于热心的志愿者”。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与其从外部批评，不如从内部参与这样的项目。因此，当他提出开展第二次美国动态跟踪调查项目，即 PSED II 时，我加入了执行委员会。

我从纯粹的组织研究者转型到创业和组织研究兼顾的身份在《组织演变》（Aldrich, 1999）一书的第一版中也体现得很明显。虽然人们通常把他当成一本关于组织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更是关于创业的。它始于组织的创建及其内部动态，并贯穿于组织边界的建立，再到组织和种群层面的变化，最后上升到社区这一层面。这本书中的许多关键思想可以追溯到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和 Bill McKelvey 一起写的一篇文章中（McKelvey & Aldrich, 1983）。在《种群、自然选择和应用组织科学》一文中，我们认为学者们可以使用变化—选择—保留（variation-selection-retention）方案来实现对组织变革的全面了解。在具有很大异质性的组织种群中，没有任何组织能够代表种群的中心趋势——各组织之间将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为选择性淘汰的演变铺平了道路。生存下来的组织将被复制，从而在种群中传播这一种新的形式。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性的观点。我在 1999 年的书中借鉴了这些观点，然后又与 Martin Ruef 一起创作了 2006 年版（Aldrich & Ruef, 2006）。

六、给年轻学者的建议

人们以前之所以避免提及“创业”，是因为

— 10 —

它并不像研究大公司及其并购和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那样令人兴奋，但是创业这个领域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和趣味。当你研究大公司，比如以前被创业学者青睐的上市公司时，你会发现在美国只有大约 5000 家上市公司（Aldrich & Ruef, 2018）。创业却并非如此：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试验，有很多变化需要研究。而且，如果你想在大公司里做一个关于组织变革的研究，你必须一直等待有趣的事情发生。而获得研究许可则意味着要征得很多人的批准，然后有很多人跟着你。相比之下，在创业公司，只有两三个人跟着。如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你可以亲眼目睹。人们很快就能明白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新的和小型的组织构成了一个研究社会网络、权力、资源依赖以及性别动态等社会过程的极佳实验室。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创业公司这个微型实验室中看到。

到了 21 世纪，我意识到创业研究人员正面临着“大数据”和“实地考察/民族志”的方法论挑战。大数据让我们能够发现以往根本不能认识到的模式。但社会科学家使用大数据或档案数据 [例如，使用专利数据、人口普查数据或政府注册项目（registry-based projects）的数据，如瑞典的医疗保险和劳动力市场纵向一体化数据库（LISA）或丹麦的 IDEA] 的危险在于，与实际现象有一定的距离。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写下的一篇关于创业研究方法的早期文章中，有一个论点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从事真正的实地研究，如民族志和观察性实地考察（Aldrich, 2000）。我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人员敢于冒险进入新创企业，或者孵化器和加

速器，并在里面四处看看，花几天时间观察、记笔记、做文字或影像或音频记录，如果允许的话，还可以进行小型实验、以创新的方式收集数据——这样做的人还不是很多。

我希望看到创业研究人员在进行民族志时，记录下创业者典型的一天、一周或一个月究竟是在做什么（Stewart & Aldrich, 2015）。他们怎样分配自己的时间？在会议上花了多少时间？这些人是否像明茨伯格在《管理工作的本质》（1973）里面写的一样，每日文山会海，无暇思考战略？在明茨伯格的研究中，管理者大多困于回复备忘录、接打电话和下达命令。有些学者可能是天生的民族志研究者，善于观察人们的行为并对此作出解释，然后与他人交流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的理论意义。我希望对创业或组织感兴趣的年轻学者们在开始使用档案数据集（那种别人给他们的或从网上下载的数据集）之前能三思而后行，比如先去到一些初创公司参访。

在专业会议上，我总是惊诧地发现人们对自己正在研究的东西知之甚少。我在博士生论坛上碰到了一些人，并与之谈及他们的研究方案，我会问到关于他们的项目的问题。比如，“你在研究那些游戏软件制作者，在他们的店里是什么感觉？”他们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到实地去看过他们怎么做的。”或者我问：“生物技术公司是什么样的？实验室里怎么样？科学家和创业者之间的互动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调查人员都无法回答关于项目的基本描述特征的问题，这让我感到惊讶。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书中读到了什么或者某本代码书是怎样描述这些变量的，但这远

远不够。如 Watson（2011）指出的，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你清楚自己在研究的是什么，请给我一份关于这个领域的实地报告。

我许多项目的规划和执行都是历时多年完成的。我对美国三个城市的小企业的研究设计于1965年开始从1966年到1972年都在收集数据。编码和分析数据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因此直到1974年我才提交第一篇论文。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一直依靠这些数据发表论文。同样，我在英国的研究也是如此——1975年形成概念，1976年设计，1978年至1984年进行数据收集。第三个例子，我的贸易协会项目在80年代初设计并获得资助，在90年代初才发表论文。我的许多其他项目也都是用年而不是用月来衡量的。因此，我对年轻学者的建议是如果要从从事大规模的长期研究项目，你需要同时开展多个研究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应该有不同的起止时间。对多个项目的长期规划需要从你的博士生导师在你的论文上签字开始。

七、我目前对创客运动的研究

我的好朋友 Jerry Davis 以他的热情和乐观精神吸引了我去研究创客运动（Davis, 2013）。他为我安排了一次与 Ted Hall 的会面。Ted Hall 是 ShopBot 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创客运动领导者。Davis 知道我对技术和技术革命感兴趣。因为我的长子 Steven 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他在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里工作，所以我一直对高科技很感兴趣。我查了一下 Ted Hall 正在从事的工作，结果发现这提供了进入一个惊人的

新运动的入口。人们通常会把“黑客”这个词和电脑软件联系在一起，但它在开放源码硬件方面也掀起了非常有影响力的运动。

我发现技术变革（如 3D 打印、缩小到桌面尺寸的数控机器、激光切割机等）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原型开发和实验方式。传统的工艺技术（如缝纫、编织和创意阶层的其他工具）也带来了变化。我了解到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制造和分配的方式并不能充分利用人类内在的创造力；如果人们能利用这些工具去发挥自己的潜能，那么这种创造力就会得到释放。21 世纪的人们习惯了送货上门。他们被告知，东西就是这样的——“不要拆开那台电脑、电话或家用电器，不然你会把它们弄坏的”。在创客运动中，人们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人类可以把制造商制造的东西从货架上拿下来、拆开，看看它的内部，弄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并且通过“黑客入侵”，添加一些东西或重新设计，让它变得更好。他们甚至可以将另一个程序放入它的控制器中。

我从 2012 年开始认真阅读创客运动的有关内容。截至目前，我已参观了许多创客空间，并且能够对这个运动做一些相关的介绍。我花了几天时间去学习如何使用数控机床。我发现，新产业革命的潜力似乎正在显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客运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全球性运动，旨在让人们控制自己的命运。与创客运动相结合的新技术将使人们能够利用工具为自己制造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很简单，比如你玩的东西，或者在厨房、汽车和车库中有用处的东西。这是一套适应性极强的技术。

这一发展方式的重要之处在于，创客空间

正通过各种汇聚的资源被整合到一起，如 Kickstarter 众筹运动（Mollick, 2014）。成千上万的创客空间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呈现燎原之势（Browder et al., 2017）。创客空间在包容的基础上，提供非常灵活的机器，并经常为缺乏经验的创客提供一些咨询帮助。用户有时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设备，或者只为材料付费，并且有机会去设计能丰富自己生活的东西。从创业的角度看，让我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些项目确实具有商业潜力，其中一个例子是 Pebble Watch，它就是从 Kickstarter 运动开始的（针对物质实体的黑客：一种带有内部微控制器和传感器手环）。它的创立者并没有去找风险投资人或天使投资人。相反，他去了 Kickstarter 众筹平台，筹集到了资金。

如今，成千上万个在创客空间工作的人身上都有 Sonali Shah、Mary Tripsas 和 Eric von Hippel 所提出的用户驱动创新的潜力；他们注意到，当人们使用现成的设计时，往往会发现创新点，并找出改进的方法（Shah & Tripsas, 2007; Von Hippel, 2005）。在创客空间里，你并不只是局限于一把锤子和一个螺丝刀，你还有数控机床、3D 打印机和计算机软件设计程序的协助去做工艺活；这些在 15 年或 2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下一场革命可能就会在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中产生。

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一种反熊彼特的扭曲镜头去看：如果大公司的研发实验室是发明和创新的唯一力量，我们会困于实验室那群人所能产生的想象力中。在大公司的等级制度中，人们被安排在项目中工作，在如何实现他们的目标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

权。如果有跟大公司一样的资源，缩小其规模，并把其工作人员派到创客空间去工作，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将让用户在认识到本地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创新，而不是让企业议程推动创新。创客运动和当地匠人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的可能性，意味着创新以及它们产生的变化很有可能改变当地人民的生活。这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未来。

八、结语

过去 50 年，渐进式变革使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创业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加强对组织以及组织运行机制的理解，就要把管理和组织理论与演化思维结合起来。我非常幸运能够见证这个新视角的成形，并且十分荣幸能够为增进对其的理解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向优秀的导师以及他们世界一流的研究和理论建构战略学习，我获得了相应的知识和经验，去为不断发展的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以及创业研究领域做出贡献。我相信，当前的环境为未来的学者提供了成熟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在这些洞见的基础上，去研究创业的过程和结果，并评估创业者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种种途径。

接受编辑：Haiyang Li

收稿日期：2019 年 1 月 16 日

接受日期：2019 年 1 月 20 日

翻 译：罗银燕、李晓林

校 对：编辑部

作者简介：Howard E. Aldrich，于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拉格勒商学院战略与创业研究兼职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创业、创业团队组建、性别与创业及演化理论。

参考文献

- [1] Aldrich, H. E. 1971.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conflict. *Human Relations*, 24: 279-293.
- [2] Aldrich, H. E. 1975. Ecological succession in racially changing neighborhoods. *Urban Affairs Review*, 10: 327-348.
- [3] Aldrich, H. E. 1992. Methods in our madness?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Donald L. Sexton, & John D. Kasarda (Eds.),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Entrepreneurship*: 191-213. Boston: 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
- [4] Aldrich, H. E. 1999. *Organizations Evolving*. London: Sage.
- [5] Aldrich, H. E. 2000. Learning together: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Donald L. Sexton, & Hans Landström (Eds.),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5-25. Oxford, UK: Blackwell.
- [6] Aldrich, H. E. 2001. Who wants to be an evolutionary theorist? Remark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year 2000 OMT distinguished scholarly career award present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10: 115-128.
- [7] Aldrich, H. E., & Albert, J. R. J. 1976.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succession: Changes in the race composition of neighborhoods and their busine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846-866.
- [8] Aldrich, H. E., & Auster, E. R. 1986. Even dwarfs started small: Liabilities of age and size and thei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 Barry M. Staw, & Larry L. Cum-

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165–19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9] Aldrich, H. E., & Baker, T. 1997. Blinded by the cites? Has there been progres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Donald L. Sexton, & Ray W. Smilor (Eds.), *Entrepreneurship 2000*: 377–400. Chicago: Upstart Publishing Company.

[10] Aldrich, H. E., & Cliff, J. E. 2003.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573–596.

[11] Aldrich, H. E., & Fiol, C. M. 1994. 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645–670.

[12] Aldrich, H. E., & Kim, P. H. 2007. Small worlds, infinite possibiliti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 147–165.

[13] Aldrich, H. E., & Martinez, M. A. 2015. Why aren't entrepreneurs more creative? Conditions affecting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hristine E. Shalley, Michael A. Hitt, & Jing Zhou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ultilevel Linkages*: 445–45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Aldrich, H. E., & Pfeffer, J. 1976.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79–105.

[15] Aldrich, H. E., & Ruef, M. 2006. *Organizations Evolving* (2nd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6] Aldrich, H. E., & Ruef, M. 2018. Unicorns, gazelles, and other distractions on the way to understanding real entrepreneurship in America.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2: 458 – 72. doi: 10. 5465/amp. 2017. 0123.

[17] Aldrich, H. E., & Staber, U. H. 1988. Organizing business interests: Patterns of trade association foundations, transformations, and deaths. In Glenn R. Carroll (Ed.), *Ecolog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s*: 111–126.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8] Aldrich, H. E., & Whetten, D. A. 1981. Organization sets, action sets, and networks: Making the most of simplicity. In Paul Nystrom, & William H. Starbuck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esign*: 385 – 40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Aldrich, H. E., & Zimmer, C. 1986.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D. Sexton and R. Smilor (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3 – 23. New York: Ballinger.

[20] Aldrich, H. E., & Baker, T. 2001. Learning and legitimacy: Entrepreneurial responses to constraints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populations. In Claudia B. Schoonhoven, & Elaine Romanelli (Eds.), *The Entrepreneurship Dynamic: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es*: 207–2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Aldrich, H. E., & Martinez, M. A. 2001.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5: 41.

[22] Aldrich, H. E., & Yang, T. 2013. How do entrepreneurs know what to do? Learning and organizing in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4: 59–82.

[23] Aldrich, H. E., & Zimmer, C. 1986.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Donald Sexton, & Ray Smilor (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3–23. New York: Ballinger.

[24] Aldrich, H. E., Cater, J., Jones, T., McEvoy, D., & Velleman, P. 1985. Ethnic resident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protected market hypothesis. *Social*

Forces, 63: 996-1009.

[25] Aldrich, H. E., Cater, J., Jones, T., & McEvoy, D. 1983. From periphery to peripheral: The south asian petite bourgeoisie in England. In Ida H. Simpson, & Richard Simpson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2: 1-3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6] Aldrich, H. E., Elam, A., & Reese, P. R. 1996. Strong ties, weak ties, and strangers: Do women business owners differ from men in their use of networking to obtain assistance? In Sue Birley, & Ian C. MacMillan (Eds.), *Entrepreneurship in a Global Context*: 1-25. London: Routledge.

[27] Aldrich, H. E., Renzulli, L. A., & Langton, N. 1998. Passing on privilege: Resources provided by self-employed parents to their self-employed children. In Kevin Leicht (Ed.), *Research i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6: 291-317.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8] Aldrich, H. E., & Kenworthy, A. 1999. The accidental entrepreneur: Campbellian antinomies and organizational foundings. In Joel A. C. Baum, & Bill McKelvey (Eds.), *Variations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In Honor of Donald T. Campbell*. Newbury Park, CA: Sage.

[29] Alex, S., & Aldrich, H. E. 2015. Collabor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anthropology researchers: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9: 173-192. doi: 10. 5465/amp. 2013. 0161.

[30] Baum, J. A. C., & Amburgey, T. L. 2002. Organizational ecology. In J. A. C. Baum (Ed.), *Companion to Organizations*: 305-326.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1] Bill, M., & Aldrich, H. E. 1983. Populations, natural selection, and applied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 101-128.

[32] Bradley, S. W., Aldrich, H. E., Dean, A.

S., & Wiklund, J. 2011.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rvival: Asymmetric paths of young independent and subsidiary organiz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2: 486-509.

[33] Browder, R. E., Aldrich, H. E., & Bradley, S. W. 2017.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makers, and the maker mov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abson College 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 Norman, Oklahoma.

[34] Campbell, D. T. 1969.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General Systems*, 14: 69-85.

[35] Cliff, J. E., Langton, N., & Aldrich, H. E. 2005. Walking the talk? Gendered rhetoric vs. action in small firms.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63-91.

[36] Converse, P. E. 1976. *The Dynamics of Party Support: Cohort Analyz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37] Daniel, K., & Robert, L. K. 197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38] Davis, A. E., Linda, A., Renzulli, L. A., & Aldrich, H. E. 2006. Mixing or matching? The influenc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n the occupational diversity and density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networks. *Work and Occupations*, 33: 42-72.

[39] Davis, G. F. 2013. How affordable CNC can remake industry: Thoughts 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structure. In T. Hall (Ed.), 100kGarages.com, 2015. Durham, NC: Ted Hall.

[40]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41] Ethan, M. 2014. The dynamics of crowdfund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 1–16.

[42] George, K. 1964. *The Mass Consumption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43] Hannan, M. T., & Freeman, J. H. 1989.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4] Henry, M. 1973. *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45] Hunt, C. S., & Aldrich, H. E. 1998. The second ecology: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ti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 In Barry Staw, & Larry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 267–30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46] Jeffrey, P., & Salancik, G. R.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47] Kim, P. H., Kyle, C., Longest, K. C., & Aldrich, H. E. 2013. Can you lend me a hand? Task–role alignment of social support for aspiring business owners. *Work and Occupations*, 40: 211–247.

[48] Kim, P. H., & Aldrich, H. E.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1: 1–52.

[49] Kim, P. H., Aldrich, H. E., & Keister, L. A. 2006. Access (not) denie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human, and cultural capital on entrepreneurial en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7: 5–22.

[50] Lance, K., & Aldrich, H. E. 1983. Mintzberg was right!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 *Management Science*, 29: 975–984.

[51] Martinez, M. A., & Aldrich, H. E. 2014. Sociological theories applied to family businesses. In Leif Melin, Mattias Nordqvist, & Parmodita Sharma (Eds.), *The SAGE* — 16 —

Handbook of Family Business; 83–99.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52] Martinez, M. A., Yang, T., & Aldrich, H. E. 2011. Entrepreneurship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Research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1: 1–4.

[53] Renzulli, L. A., Aldrich, H. E., & Moody, J. 2000. Family matters: Gender,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outcomes. *Social Forces*, 79: 523–546.

[54] Roger, W., Aldrich, H. E., & Ward, R. 1990. *Ethnic Entrepreneurs: Immigrant Businesse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55] Ruef, M., Aldrich, H. E., & Carter, N. M. 2003. The structure of founding teams: Homophily, strong ties, and isolation among U. 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195–222.

[56] Shah, S. K., & Tripsas, M. 2007. The accidental entrepreneur: The emergence and collective process of user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 123–140.

[57] Stephen, L. 2007.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onsolidation: Radio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34. *Social Forces*, 86: 467–495.

[58] Stephen, L., & Aldrich, H. E. 2014. History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In Marcelo Bucheli, & R. Daniel Wadhwani (Eds.), *Organizations in Time: History, Theory, Methods*; 124–1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9] Stephen, L. 2005. Public airwaves, private interests: Competing visions and ideological capture in the regulation of U. S. broadcasting, 1920–1934. In H. Prechel (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4: 111–150. Bingley UK: Emerald.

[60] Ted, B., Aldrich, H. E., & Liou, N. 1997. Invisible entrepreneurs: The neglect of women business owners

by mass media and scholarly journ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9: 221–238.

[61] Tyler, W., Adam, J. C., & Aldrich, H. E. 2013. More than a metaphor: 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promise as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plexit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 441–488.

[62] Von, H. E. 2005. *Democratizing Innov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63] Wallerstein, I. M. 2004. *World 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64] Walter, B. 1967. *Sociology and Modern System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65] Watson, T. J. 2011. Ethnography, reality, and

truth: The vital need for studies of “how things work” in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8: 202–17.

[66]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7] Yang, T., & Aldrich, H. E. 2012. Out of sight but not out of mind: Why failure to account for left truncation biases research on failure rat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 477–492.

[68] Yang, T., & Aldrich, H. E. 2014. Who’s the boss? Explain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entrepreneurial tea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303–327.